

“两个结合” 开辟思想政治教育新境界

高国希

[摘要] “两个结合” 是在 5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同时也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两个结合” 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方法论指南，“第一个结合” 从空间维度上让游荡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东进扎根于古老的中华大地，让马克思主义说中文；“第二个结合” 从时间维度上使悠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时代的历史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同时克服、超越了西方既有现代性的局限。“两个结合” 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涵，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坚定了理论自信；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核心功能，通过增强“两个结合” 的精神自觉性，坚定文化自信，激发人民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

[关键词] 两个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主体性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高国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两个结合”不仅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且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开辟出新的境界，使思想政治教育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提供主动奋发的精神力量，从而更好地发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功能。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逻辑及其历史超越研究”（20BKS092）阶段性成果。

一、“两个结合”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方法论指南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价值教育,与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与这个共同体的信仰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相联结,而这些文化观念又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要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状况相结合,因时因地因势地运用。

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是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社会一直以来扑朔迷离的各种猜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找到了科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文明大道”上产生的,“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1](P317-318)}“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2](P217、218)}“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3](P495)}“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4](P418)}“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4](P309-310)}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欧文明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革命性变革的新学说,无论是材料的占有、实证的分析,还是叙述的逻辑方法,基本上都是在适合西欧社会状况的语境中展开的论述,即使是对于同属欧洲文化的俄国,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认为情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第一个结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从空间的维度,“第一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这个原来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来到了占世界人口1/5的古老中华大地扎根,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扩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拥有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空间、历史空间、价值空间。

100多年前,陈望道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920年在上海出版,马克思主义开始以全本中文的形式出现,在关键概念的汉字用语斟酌上会意传神,颇有建树,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化开启了筚路蓝缕的征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潮百舸争流,各种主义竞相出场,比如,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宣言》翻译那个时段正好在华讲学,但更多是在教育思想方面影响了中国。在影响并变革中国社会方面,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

1872年德文版序言所指出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其科学性，正如《宣言》出版25年后的序言所说，《宣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而它最初所批判的曾经显赫一时的、强大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十月革命的炮响为古老的中国大地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是就恍如隔世的时代而言，还是就茫然陌生的地域而言，这一学说都与当时的中国相去甚远，但在当时以此为指南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开始说中文。在坚定的科学信仰中，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发展壮大，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中国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跨越空间，在东方大地体现、见证其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活的灵魂具有同构性。在这个结合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我国具体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5](P17)}充分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P691)}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每一个部分从头开始研究、分析、判断，不能把这个“一般历史哲学理论”^{[3](P467)}当作“超历史”的“万能钥匙”，去套出一切社会的简单化结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7](P707)}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大法宝。

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来，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劫难，各种救亡与启蒙的方案都未能奏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唯物史观特别是《宣言》中译本的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了主心骨。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纲领。土地革命时期，在残酷的现实中建立革命的武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后来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重大损失。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新阶段，在延安，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不断丰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

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第二个结合”,不仅跨越了空间,还跨越了时代,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文明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与东方国家的结合,也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的高度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更与中国人民的价值选择一致,马克思主义指明的科学道路,使中国人念兹在兹的夙愿追求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拥有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内涵,使古老的传统得以凤凰涅槃,焕发生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赋予了古老东方的智慧涵义,使之更为深厚、丰富、绵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欧洲的研究,当时体现的是最先进的时代精神。当欧洲文明囿于资本的利益而裹足不前时,超越于这一社会形态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便取而代之,成为时代的趋势。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存在于现实运动之中。

从时间与时代的维度,“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实现了历史跨越,使传统的成为现代的,同时又克服、超越了现代性的局限。所以,跨越的机制、契合的关键点非常重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命题有其前提,中华文明与现代性能够对接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明的正确方向、现代性的真正出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力量和精神性,照亮了现代精神生活。^{[8](P113)}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促进人的发展,大工业“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9](P561)}但西方既有的现代化的过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有着现代性的一般特征,也有其特殊的局限、问题、困境,带来了诸多的危机。比如,现代性被脱域,成为抽象的体系(吉登斯),在时空无限制下,相较于传统的信仰,西方展示的现代性带来了“个人之无意义的威胁”。中国式现代化克服现代性的诸多局限与不足,使现代化成为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使得悠长的中华文明有了现代力量,历久弥新;中华文明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加深厚的底蕴。赓续古老文明,使文明得以更新和重生,而非断裂和消灭。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华文明中生长出的现代化,在与时俱进,批判借鉴吸取域外文明成果,汇通熔铸的基础上,获得了蓬勃的生机活力。如此的境界彰显出“两个结合”在根基上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带给思想政治教育以科学的坚实指导与生动启示。

二、“两个结合” 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深刻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基础，植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承载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演绎着有着旺盛生命力的、根深叶茂的历史和现实的画卷。“两个结合” 彰显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生动、深刻的内涵，给予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启示。

第一，守正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我们以科学的世界观解读时代、分析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武器。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可以在纷纭复杂、波谲云诡的变化世界中，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不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是发现人类社会规律的真密科学，体现在其立场情怀和价值追求上。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发展的论述，不是从先验的抽象观念出发，而是把道义的立场奠立在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基础上，从物质生产关系这一根基的深度指明人的自由与解放途径。实现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为人民谋幸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准确认识和恰当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直面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风险与挑战，以宽广视野深入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外部条件、变化趋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动力、途径和方法，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特别是价值观自信，注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注重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深刻体现了“两个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二，彰显马克思主义这一深刻真理性理论的彻底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更加坚定理论自信。“两个结合”，因其时代和空间的跨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在西方经历了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自经济全球化以来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从西方既有的现代化过程来看，现代性是针对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区别而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使得“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P34-35)}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自“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资本则狂欢痛饮来庆祝胜利”。^{[9](P320-321)} 这里的“自然”一词，也有本性、本然、天性之意。

资本主义有其内在的文化矛盾，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其

经济、政治、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已经有了清晰的揭示，并提出了“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亦即“精神危机”。^{[10](P28)} 马克思犀利地看到了现代性的成就与困境，正如他既看到资本的文明史作用，认为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本家有其历史的价值、历史的存在权，又痛斥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既热情地赞颂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创造的物质条件，“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9](P683)} 同时又把资本主义的形式与人的发展的实质剥离开来，对于资本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予以深刻痛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9](P683)} 它狂热地追逐资本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为了生产而去生产，从而客观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将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樊篱，让这种在社会历史上仍是暂时的雇佣劳动形式让位于带着兴奋愉悦心情的联合劳动。马克思对治现代性的问题，不是避开它，而是深入到其本身，强调“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1](P182)} 通过现代性自身矛盾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成长，突破其局限，从而克服其弊端。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希望通过一种更加充分并且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医治现代性的创伤”，^{[8](P126)} 马克思“能够给予我们的宝贵礼物，不是一条摆脱现代生活的矛盾的出路，而是一条更加有把握更加深入的进入这些矛盾的道路。他知道，超越矛盾的道路将不得经过现代性，而不是摆脱现代性”。^{[8](P165)}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曾经是使得世界现代化的力量；然而现在，资本主义却成了现代性的一种桎梏和拖累，为了现代工业的不断革命以保持发展，以及为了‘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出现和繁荣，资本主义不得不卷铺盖了”。^{[8](P476)} 无论从理论的逻辑上，还是从现实实践上，超越既有的现代性模式，都是必然的使命。这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扬弃改造了的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11](P205)}

第三，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观，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着独特的价值观、道德观，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相合。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表明，社会主义生产是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资本增殖的生产目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方面，马克思有着深刻的阐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明确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2](P31-32)}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交换价值为目标，交换价值换算为价值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目标，使用价值根本不是这里考虑的因素，所以，在这时，不可能有“使用价

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这类的假的“辩证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劳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要劳动是通过剩余劳动并且为了剩余劳动而存在的劳动”，为了剩余劳动，而尽可能地减少必要劳动的时间。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资本是要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还没有使劳动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

而社会主义则与此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在未来的新社会，使得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这种劳动就是真正的生产劳动，每个生产者就能够利用这一时间来实现他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这种联合不是任意的东西，它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12](P53)} 我们说，这也就理所当然地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条件保障。

这里也彰显了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进一步从理论逻辑上为我们提出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给予了支撑。我们坚持人民至上，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这种共同富裕，既有物质的共同富裕，也有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也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13]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思想政治教育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推进自身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为指南，以中国火热的伟大实践这个现实源泉为动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为滋养，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华文化基因之根、改革开放的现实实践之源。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处在不同的社会之中，而社会又有着自身的文化和传统，当然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特殊的生产方式、特殊的交往方式、人际交往关系，造就了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特殊的价值观念、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思想政治教育又要以其自身的解释力、凝聚力、吸引力、亲和力来感召人。马克思主义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价值追求，深得人心，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实现找到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指出的科学道路指引着人们，使这一价值观成为具体的、现实的、真实的。理论的科学性需要在现实中不断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今天得到不断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马克思主义拥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纵深,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得以发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源远流长、深邃辽远的价值滋养。这对思想政治教育讲深讲透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其彻底性,讲深讲透人民至上的立场和价值,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内涵。

三、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两个结合”的精神自觉性

“两个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视野更为宽广,从5000多年的文明史来看待我们的道路设计、文化构建、价值选择,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创新未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文化主动精神,生机求变,自立自信自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社会的火热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的教育,增强社会成员对中国现代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核心功能,更好地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思想政治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贯穿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各领域各环节,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更好地发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功能,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生动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奋力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根本上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也是我们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的重要一步。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社会主义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坚持人民情怀,要求发挥人民主体性、激发历史主动精神,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促进人民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共同富裕。“两个结合”,既保证了我们的理论正确、道路正确,又以鲜明的民族形式体现出文化特点,彰显科学性与道义性,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 倡导和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第二, 巩固文化主体性,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涉及继承与创造的辩证法。在解释学看来, 解读者在全新的语境中去领悟话语当时的情境, 使富有意义的文本在新的、开放的视野中展开, 在经典的文本与实际的情境意义之间, 达至视界的融合。而“两个结合”产生的就是有机统一的新生命体, “结合”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形态, 使久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火热的现实实践中得以焕发生机。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 “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 而是生命洋溢的, 有如一道洪流, 离开它的源头愈远, 它就膨胀得愈大”。^{[14](P8)}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 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 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5] 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来自党对社会发展的科学把握, 体现出鲜明的历史主动精神。“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5](P14)}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对外来优秀文明成果的批判借鉴吸收, 都深刻地体现了文化主体性, 发挥出党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 我们的民族与人民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 在这一文化主体性上, 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 有着坚实的根基立场, 就能够博采众长, 自立自信自强。交流互鉴的前提是自信自立, 根基是自在自为自主的存在主体在此之上建立各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主体性启示我们要有主动性、能动性、自觉性、自主性。唯物史观认为, 主体性的根基是人的实践活动, 是人这一主体的力量显现, 对于对象、现实、感性, 也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而不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人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规定了人们对现存事实的理解和解释的那些前提, 这正是“能动的生活过程”。主体性的真正发挥还要达到感性的活动, 即实践变革。“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如前所说, 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 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 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11](P547)} 真正的主体性的发挥, 也需要社会前提与条件, 需要从私有制中解放出来, 一个人的感性实践能力才能从被束缚状态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立足于感性的人的活动, 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以人的实践来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通过历史的活动, 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即以“彼岸的”“自由能力的发挥”为目的,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 既不盲从教条, 也不照搬外国理论, 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建立起了坚定的自主性。

“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15]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 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是我们党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个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 一定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现代的、也是具有世界

意义的,有着具体而丰富的内涵。“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7](P706-707)}立足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随着时间的流逝,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也都面临着辩明证成的阐释任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16](P13)}而实践让理论彰显现实性和力量。中华文明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具体鲜活的形态,以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获得新的生命力,“两个结合”成就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赋予古老的中华文明以现代形态,使170多年前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17]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树立一种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在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的大势中,审视我们自己的发展方向,为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支撑。中华文化有着自身的独特性,5000多年的文明中形成了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造就了深深的家国情怀。传统中国由“聚落形态”走进王朝形态的国家文明时代,是在“保存家族—宗族这种原始聚落遗制”的情况下,由早期国家逐渐转化为王朝形态的国家”。^[18]中国古代的宗族城邦,可以推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此后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是宗族城邦的发育期,之后到夏朝的建立,是宗族城邦的成熟期,如雨后春笋一般到处生长出来,难以胜数。按史籍所说,其时有“万国”之多,可分为同姓族邦和异姓族邦,^[19]“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着氏族、宗族、家族、家庭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体系。由于氏族只有横向的松散的关系,所以社会的基本构架是由宗族组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这种宗族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20]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这种家国情怀、这种“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而不是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悠久绵长,深入中华儿女的骨髓,成为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一个主要特征。人类学家格尔茨指出,政治、诗学、法律、民族志“都是地方性的技艺,它们都凭借地方知识来运作”。^{[21](P261)}百余年来我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争鸣,就表明了学术界努力改变以往以特定的模式来框套、比附地解释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尝试。

如何对待文化传统、如何对待历史经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指导,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的不同,看待的方式就会迥异;泥古守旧,也就无从创新。比如,梁漱溟曾认为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这一套西洋把戏,于吾历史习惯、民族精神至不合也”,“共同信奉一主义,要许多人结合起来往前走,此中国夙昔殆所未有之事,尤于中国士人风气习惯不合”,

并认为“一改消极无为的政治史而积极有为”^{[22](P293)}的如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党在中国是建立不起来的。但他当时没有看到，真正的志士仁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立于工农的立场，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一开天辟地的壮举，敢教日月换新天。“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17]中国共产党不求私利，唯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领导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伟大成就，书写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恢宏的史诗。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条分缕析，增强人民群众对“两个结合”的共识，通过教育让党的创新理论为群众所掌握，深入亿万人民心中，使之“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坚守好魂和根，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发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功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8.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J].求是，2023，（19）.
- [1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15]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1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7]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2，（14）.
- [18] 卢钟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J].历史研究，2011，（2）.
- [19] 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的真象与亚细亚形态的神话[J].史学理论研究，1995，（2）.
- [20] 田昌五.中国历史分期问题[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4）.
- [2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22] 梁漱溟全集，第5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Two Integrations” Creates the New Realm of Value-Political Education

Gao Guoxi

Abstract: The “two integrations” is the only way to open up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profound foundation of over 5000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 is the greatest effective instrument for us to achieve success; It is also the only way for us to promo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The “two integrations” provides a methodological guide for value-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a spatial dimension, the “first integration” allows Marxism, which is wandering in Europe, to move eastward and take root in the ancient land of China, allowing Marxism to speak Chinese; From a temporal perspectiv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has enabled the ancient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achieve a historical leap of the times, develop a modern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vercome and surpass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modernity. The “two integrations” provides rich connotations for value-political education, deeply reflects the dialectics of Marxism, and strengthens theoretical confidence; Adhering to the value of people first, it highlights the unique valu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ore function of value-political education is to support and lea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value-political education will fill the people with a stronger sense of history and initiative.

Key words: two integrations, value-political education, the subjectivity of culture, modernity

[责任编辑：张博婉]